

想：和平安定，怡然自得，人情淳朴，天性活泼。神话是人们大自然所具有的神秘感和威胁感在想象中的一种理解和征服，因而，它既是想象虚构的产物，又是一种把现实理想化的产物。但是，在建构理想蓝图时，神话又总是以这种面目出现，它把自己的理想国建构在过去时态上，如上引的两段神话，前者把时间推移到“往古之时”，后者把理想安放在“客成氏之时”。这样，产生在远古时代表达人们理想人生图式的神话，便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与现实对立的理想的人生社会。总是放射出古朴的光泽。这种神话内容的固定性和表现手法的模式化便成为文学上一个基本母题和基本手段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层中积淀起来，从古至今，形成了文学史上一条有意味的发展线索。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有感于社会生活的大波大浪的时代而建构了他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一方面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平宁静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把这种理想寄托在“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原始氏族社会里，因而在理想的五光十色中做的是一场远古时代的梦。到了魏晋时代，陶渊明也同样有感于时代社会生活的大波大浪而建构了他的“桃花源”理想人生模式。这一理想人生社会模式描写的也仍然是恬静，和睦，怡然自得，热情好客，自然美与人情美交相辉映。然而作者却是用“桃花源”这一特殊的载体，把自己的理想运到了遥远的先秦。那么，到沈从文的湘西小说里，不仅使这种古朴民情理想化、文学化，而且还具有一种浓厚的三楚遗风。所以，无怪乎有人指出沈从文有一种依恋过去的情

绪。实际上，人们在追求理想人生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种潜在民族心理习惯，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表现理想的“有意味的形式”。所以沈从文在构想他的理想人生模式时，不仅小说本身的取材范围和描写重点使它不得不具有一种古朴性，而且无意识的巨大磁场使他不可能摆脱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吸引，因此，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流露出某种怀旧之感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上面，我们对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作了一些肤浅表面的分析，尽管这种分析极不成熟，但它表明了笔者对沈从文作品的喜爱和重新深入分析沈老作品一种紧迫感。目前，在我国思想文化界一股寻根热来势迅猛。大家对传统文化或表现出蔑视的神情或露出亲昵的样子，都是希望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两个文明。但是，无论哪一种态度的同志，都把探寻的目光集中在绵延数千年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这个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但是，作为一种体系来说，它主要反映了我国阶级社会的整体面貌，它对人的价值的漠视造成的人性异化的恶果与封建宗法制度各种弊端是联系在一起，与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要彻底清除封建思想的余毒，一方面又想保留这一文化传统之根，在今天似有困难。我想，我们能否从沈从文的人生社会理想图式的构想中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参数，或者直接从荆楚文化序列中找到生命的根，活的根。我想，这就是研究沈从文小说最大的现实意义。

## 未收入《沈从文文集》的沈从文著作集

邵华强、凌宇编纂的《沈从文文集》十二卷于1981年3月至1984年11月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文集》共收录了沈从文在解放前出版的四十七种著作和大量集外逸文，总篇幅共有三百六十余万字。据笔者查证，除更大量的集外佚文没收入《文集》外，还有十六种著作集没编入《文集》。

据统计，全书未收录的有8种：《第二个狒狒》（1926年北京晨报社初版）、《市集》（1926年北京晨报社初版）、《呆官日记》（1929年上海远东图书出版公司）、《不死日记》（1929年上海人间书店出

版）、《长夏》（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刽子手》（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旧梦》（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看虹摘星录》（1940年江西出版）。个别篇章选入，但整书没收入的有《鸭子》（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昆明冬景》（1940年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等两种。

此外，解放后文物考古论文集均没收入《文集》。它们是：《中国丝绸图案》、《明碑》、《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明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6种。

（许 吕）